第 12卷第 2期
2011年 4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12 No.2
Apr 2011

“左”的游移与归途

——评《思想的谱系》中佩里·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性反思

江 书 陆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文章从客观、公正的视角辨析了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理论,尤其是中后其理论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透彻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是深入对话的结果,又是进一步对话的动力。

[关键词]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佩里·安德森; 公共领域; 对话
[中图分类号] D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010-05

继《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后现代的起源》和《交锋地带》之后,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最新一部力作《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推出了中译本。对中国的读者而言,这绝对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该著作所关注的思想家和作家,个个都是其研究领域中响当当的人物。安德森把他们分归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然后,展开他全景式谱系分析的宏伟计划,要从低到高把所有音阶唱上一遍。

哈贝马斯,这位被公认为20世纪末最伟大的思想家,毫无疑问也被纳入了安德森的“谱系分析清单”。只是,在安德森眼里,哈贝马斯似乎已不再是同一阵营里的亲密盟友,而把他归于中间派,并以“可调整的中心”来形容其模棱两可的暧昧立场。这对我们而言,或者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论断。哈贝马斯与安德森,一个是享誉世界的当代思想巨擘,另一个是雄踞北欧的一代思想大家,两人都在左翼阵营中发挥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今,却以这种“微妙的紧张关系”呈现于我们眼前。那么,安德森是如何通过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性反思与其具体展开思想与价值的交锋?我们又该如何公允地判断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此外,由安德森发出的对峙之势对维系和发展“左翼”阵营的共同理想将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影响?本文将主要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以求能对这两位“大家”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产生一些更深入的解读。

一

透过其以往的学术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佩里·安德森虽然以历史学家出名,却同时具有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多重学科视野,从这本新作《思想的谱系》中我们也可略见一斑。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宏大的总体性分析与言辞犀利的批判是安德森一向偏好的论述与交战风格。而哈贝马斯作为在国际学术界都享誉盛名的“跨学科”多面手,视野广博,思想精深,著述丰厚且自成体系。

对安德森而言,与哈贝马斯的遭遇,绝对算得上“棋逢对手”。因此,在对哈贝马斯相关著述的批判性反思中,安德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以往尖锐激烈的论战风格,但同时,他也显得更加谨小慎微。安德森并没有贸然地直接切入分歧的焦点进行武断的审判,而是将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置于历史的长轴上,从他的首部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开始,直至其最近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顺着此间哈贝马斯演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逻辑主线与之展开具体和历史的批判性对话。之所以称之为对话性批判,而不是独白式批判,是因为哈贝马斯也被置身于这场“虚拟”的对话之中:当一个个挑战性问题被抛出时,紧接其后的是哈贝马斯的相关解释或解题路径,在此基础上再发出新的质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时间为序列,逻辑地展开。通过多层次的思辨性交锋,安德森对哈贝马斯作出了全面彻底且较令人信服的批判。

作为左翼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和领军人物,安德森对同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哈贝马斯的观察,深深渗透着激进式左翼分子最崇高、最纯粹的价值理想——平等、民主、人权,以及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与边缘阶层之疾苦和压抑状态最深切的关怀。因此,与哈贝马斯的其他批评者相比,安德森反思的中心和落脚点不仅仅只停留于理论预设前提的合理性、逻辑思辨的规范性、经验上的可证实或证伪性、所设变量因素的复杂性与全面性等方法论层面,而更在于其对纯粹的左翼价值理想的坚守。反思前者只是作为实现后者的策略和

[收稿日期] 2011-03-16
[作者简介] 江书陆(1977-),男,江西都昌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手段。或者,“痛心疾首”或“恨铁不成钢”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也是牵引他对哈贝马斯进行不客气批判的最强烈的动力。

如果说,安德森对哈贝马斯早期著作的批判更多的是基于同一阵营之身份认同下,为实现同一目标的“交流式”批判,那么,对哈贝马斯中后期著作的批判则更多是基于“异己性”之身份判断下,质询其意识形态与价值目标的“交锋式”批判。

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在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评述中,对哈贝马斯所力主的沟通理性及其所运用的历史分析与现象学描述的方法是持肯定态度的,或者更令他欣赏的还是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的理想。对于公共领域理论模式的评价,安德森完全是站在与哈贝马斯相同的结构视角内进行审视的。他所提出的公民民主自身的缺陷、经济和政治等外在压力对公共领域的侵蚀、自由宪政国家起点的合理性等问题,恰恰也是哈贝马斯自身所深度关切与忧虑,且在其后期所致力于解决的。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批判,倒不如说这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延伸和拓展。

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越到哈贝马斯中后期的著作,安德森愈发显得不客气起来。在对《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评述中,安德森终于把左翼传统中意识形态揭示与反叛的枪口指向了昔日的盟友。在安德森看来,哈贝马斯至少犯下了三个传统左翼所不能容忍的错误。

首先是对不平等的漠视。安德森指出,“不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有多么的不平等——让我们申明,这种说法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几乎完全找不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产生的法律结果仍然会是‘公正的’,倘若它们获得的相互交谈的机会是平等的话。随着这跟魔杖的挥动,不平等竟然又变成某种类似平等的东西。”虽然哈贝马斯就此问题也提供了相应的解释,但在安德森看来这终究还是“自相矛盾”的答案和“空洞”的标准①。

其次是对人民主权沦丧的容忍和默许。对于公共领域的参与式民主在实际运作中的“罕见”与“不确定”,哈贝马斯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诚然,规范的政治事务,至少随着它在西方民主政体中被当做常规引入,是不能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的。”[1]151继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在解释公民的共同努力如何能够偶尔影响那些统治着他们的人的算计时,给出了一个隐喻:“舞台上的表演者为自己的表演魅力应感谢顶层楼座上那些送给他们的赞许。”[1]155安德森认为,这种论调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坐看政治表演”的被动受众的角色被得到了默许。同时,哈贝马斯对政治代议机构的驱逐,进一步助长了系统对“人民意志”的剥夺,以至“权力留给了非人化的公共行政权威,而与任何人民意志的行使无干。”[1]157而偶尔向这一结果妥协,即哈贝马斯提出的“官僚机构应该向某种‘内部的’民主化开放”,则可以被解读为“哈贝马斯对其方案——弥补它遗漏的东西——的逻辑心怀不安。”[1]157在安德森看来,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沟通”、“意识”等核心概念的解放功能与民主效应远远不及于其政治包装和意识形态掩饰的功能。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哈贝马斯没有批评当今西方社会分散的和非政治化的政治制度中古典民主理想的退化,而是以有益的、非个人和非中心的沟通理性流的名义,为它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合理性证明。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论,以便在欧洲层面进一步消解人民主权,并且在推定的全球层面上使人民主权蒸发。”[1]186对于哈贝马斯在扩展民主的法律体系根植于其中的“更高水平的主体间性”的范围方面所表现出的缩手缩脚,安德森不禁感慨道:“人民主权再也不能被设想为集体自决,因为它的内容已因议会制度下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公共领域的自治而消耗殆尽。人民主权是在何处偏离了集体的自决呢?哈贝马斯曾一度为谁的衰落而惋惜呢?”[1]149

再次是民主理想的不断矮化。当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试图建立法制与民主的内在联系时,安德森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民主理想的不断让步与矮化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对哈贝马斯一系列论著的历史比较与话语分析,安德森指出,在建构金钱和权力的自控制体系以及生活世界的社会团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哈贝马斯一开始是“针对体制对生活世界实行殖民统治的危险发出警告,并且认为在它们之间需要某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新的平衡中‘团结的力量能够胜过其他两种控制资源的力量,即金钱和行政权力,并因此成功地捍卫生活世界的实际要求’,后来,这一点变成了“金钱、权力和团结之间某种可以接受的平衡”,再后来,他的设想又修正为“社会团结可能获得充足的力量支持自己抵抗其他两种社会力量——金钱和行政权力”。从“胜过”到“可接受的平衡”再到“支持自己”,词形的变化构成了一条曲线[1]153-154。到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部著作时,结果就成为这样一种理论,“它既没有肩负起准确描述现实的责任,也没有肩负起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提出批判性建议的责任。相反,它在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游移,……成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过时又过时的哲学。”[1]160

除了对哈贝马斯著述的批判性反思外,安德森还把批判的视角延伸到哈贝马斯对时事的参与和评论中,以进一步探寻促发其发生政治价值转向的发酵性因素——意识形态身影。从哈贝马斯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避免就地球上穷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1]183,而在对国际战争的看法上,哈贝马斯的意见更是有悖于其左翼学者的身份。哈贝马斯认为,“惩罚伊拉克公然无耻违反国际法侵占科威特的盟国军事行动,是在创建全球公共领域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它不是根据联合国的命令而进行的战争,而且不被安理会所认可,但是它诉诸了联合国,而且有这种军事行动总比没有这种军事行动好。”[1]191同样地,当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吞并东帝汶、以色列侵占东耶路撒冷并占领耶路撒冷西岸时,我们都没有发现哈贝马斯评论这些行为的记录,可以说,“践踏国际法的行为迄今从未过多地困扰哈贝马斯。”[1]192此外,在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北约攻占南斯拉夫的联军行动中,哈贝马斯更是抛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支持论”。由此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看来,哈贝马斯所自称的“忠于西方的长期立场”,以及种种迹象所透露出来的“美国偏向”是其学术视野中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幽灵。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政治情感”优先于“法律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哈贝马斯在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混乱,安德森认为,“完全归因于哲学头脑的退化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哈贝马斯在逻辑背景知识方面的不足,或没有严谨的推理能力。”[1]198于是,安德森把原因归向了良心和信义,最终他不无遗憾和痛心地指出,“在这里,哲学让位给了这样一些蹩脚的、混杂的、自相矛盾的主张和借口,而我们似乎只能用坏良心或者背信弃义才能解释它们。”[1]199

二

安德森以其非凡的智识和勇气为众多哈贝马斯的狂热崇拜者和追随者揭开了“去神话”的一面,尤其是对那些不经批判便全盘肯定吸收的哈氏拜读者而言,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性反思不可不谓振聋发聩。作为旁观者,我们有时可能会觉得安德森对哈贝马斯这样广受尊敬的学者的批判论调似乎显得过于激烈和尖锐,尤其是在质疑哈贝马斯良心和信义之时。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总体上还是建立在充分的理据之上,且恰是切中要点的。

安德森对哈贝马斯政治价值转向的判断绝不是妄下论断,事实上这也非他一家之言。有学者甚至更为激烈且具体地指出,哈贝马斯在《政治小品集》1~4卷中就已经流露出其政治思维的悄然但深刻的变化,即从一个激进的左派自由主义者向一个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过渡[2]152。至于哈贝马斯后期在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的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问题的立场及其处处所彰显的现代性和宪政爱国主义理念,则进一步说明他离昔日的“激进式”左派风格已渐行渐远了。

关于哈贝马斯的欧洲中心取向及其体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更是在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对哈贝马斯关于欧洲现代性思考中党派偏见问题的批判中,有学者就指出“哈贝马斯似乎把这种现代性看做是世界历史的时代性转换,而不是世界上许多文化中的一种。虽然哈贝马斯坚定地拒绝把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进行从优到劣的排列,但是他的理论显然是有偏好性的,也就是所谓对现代性的党派倾向。”[3]可以说,哈贝马斯是完全站在第一世界优越感的立场上来建构他的理想型生活方式的。而在对哈贝马斯宪政民主理念的观察中,也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在发展其宪政民主理念时,始终以欧洲民主,尤其是欧洲共同体的民主为模型。同时,他又在为未来欧洲宪政共和国民主,尤其是欧洲宪政共和国共同体的民主量体裁衣。”[2]197还有学者从更深层本质上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遵循的是发端于西方的资本全球化这一事实前提,而对于这一事实存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没有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分析。他根据这一未经分析的事实前提,把市场结构中产生的世俗化和多元化以及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作为世界发展和统一的唯一整合基础和途径,他并未反思全球资本主义和多元化的内在关联,更未反思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特权和落后地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4]

从反身性的视角看,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安德森所批评的那样,“最终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并陷入了悖论,而这些悖论对于其关于什么才是公正的秩序的观念而言,无疑具有毁灭性。”[1]209哈贝马斯的反身性悖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验性批判的不彻底。哈贝马斯曾在理性的立场上,认为所有的客观真理观念,其最终的依赖基础都是一种先验的规定,因而是不可靠的,需要在本体规定性及实践交往中对这种先验性加以反思和破除。他对伽达默尔之传统文化的先验性反思及其对麦奎尔道德权威的先验性反思都一度践行了自己的理念。然而,在关于自己政治道德理论起点的先验性反思上,哈贝马斯显然还很不彻底,最终不得不困顿于先验性和经验性的二元悖论之中。从对哈贝马斯一系列著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它在反思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问题时,并没有把资本逻辑作为产生异化的真正根源,而是不加反思理所当然地把市场和资本作为现实前提,从而把自己先验性地抛入到资本主义的局限之中。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反身性悖论还体现在其西方中心论之于其交往理论的悖反上。按照交往理论的逻辑,不同文化之间必须在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的机制下平等交往,从中实现对各自文化存在之前提基础的反思,继而进一步实现各自文化的合理化与再生产。然而,在实际参与和评论中,哈贝马斯所一贯表现出的西方中心论及其后期的全球化民主主张却是从西方的价值观立场出发,把资本自身无限扩张的逻辑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强加于非西方文化及其民族传统中。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以及资本给非西方国家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哈贝马斯并未做出历史和理论的反思,这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原初所提倡的交往伦理。

以此看来,安德森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无疑是深刻透彻的,可以说,他为我们重读哈贝马斯打开了一扇新窗,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意识到“话语生产陈规是一种文化栅栏。这种成规刻意地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5]29安德森的批判性话语也不例外。他在透过左翼之间理想价值相对距离的视角审视与批判哈贝马斯的时候,也不得不放弃其它很多视角,其中也包括另一种绝对性视角,那就是哈贝马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对政治理念所曾经发挥的与正在发挥的积极影响。在安德森的相对视野中,哈贝马斯从一个激进左翼钝化为温和左翼乃至中间分子,突显的是其左翼政治信念加速度的衰减。而在绝对视野中,哈贝马斯在左翼道路上所走过的漫长距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

从哈贝马斯第一部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开始,其公共领域的理想便被逐渐播展扩散到哲学之外其它更广泛的领域之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从1989年一次有关公共领域学术专题的研讨盛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领域概念在那时就已经渗透到了历史、社会科学、文学、传播学等诸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学科,以及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民主政治等广泛领域之中[6]。然而,对于这种学术事业与民主信念的成功,哈贝马斯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仅仅是将其视为长途跋涉的起点。

哈贝马斯一生笔耕不辍,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是其对交往理性、公共参与、民主价值和现代合理性等左翼政治信仰一如既往的关切与追求。

哈贝马斯一生涉猎广泛,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怀着强烈的民主理想和信念,他把自己关切的终极问题不断分解、细化,力求落于实践。

对此,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哈贝马斯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从二战阴影中的个人困扰,到人类普遍理性的价值反思,再到人类交往与民主践行的公共议题,哈贝马斯的理论图谱有着清晰的逻辑层次和显著的体系特征。且不停留于宏大理论的空洞架构,也不满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表层描摹,而是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以应然改造实然,以实然调整应然,终身致力于消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从哈贝马斯一生的孜孜以求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学者的真诚和执着,以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良善。如果不是因为怀有一种强烈的令他倍加珍视的价值,又能有什么力量可以牵引他在学术的道路上行得这么远,钻得这么深呢?

诚然,哈贝马斯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游走并不能彻底消弭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鸿沟,但是当我们看到他的公共领域理想型、理想的沟通情境和交往行为、程序式民主理念被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嵌入到社会话语的生产与实践中时,我们难道还能漠视理想和规范的现实力量么?

或许,哈贝马斯在一生的学术追寻中,所遗留和引发的新问题远远甚于他已解决或正在解决的旧问题,但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问题被如此热烈地讨论和延续思考时,我们难道不该承认他所留下的问题和他所提交的答卷一样,是一种富有价值的民主探索和学术贡献么?

再者,哈贝马斯的确未能自始自终地保持激进的左翼锋芒,但是当我们看到他坚定而执着地要将他所珍视的价值从学术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从道德伦理延伸到法律制度时,我们难道不该为他坚守、捍卫和扩大民主价值的精神而感动么?

哈贝马斯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学者,我们固然不能在“神话”的表象中放弃对他的批判,但也绝不能从他政治价值的转向中将其简单归为投机的“骑墙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扎实学术功底与强烈价值追求的真学者,我们需要更深刻的读解,更谨慎的批判。

三

学术的场域是一片喧哗之地。这里能激荡出不断开始且具有创新性的对话,也能蔓生出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无学术意义的空洞论争。此刻,我们可以辨识出两个对左翼知识生产场域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对话邀请:一个是哈贝马斯以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向自由主义发出的对话;另一个是安德森作为激进左翼成员向自称为温和左翼成员的哈贝马斯所发出的对话。其中,前一个对话是产生后一个对话的原因,而后一个对话是更新与发展前一个对话的动力。

如果说自由主义是目前占据强势且不断扩张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那么新左派则是在被挤压与边缘化中力图反抗主流并重新崛起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反抗话语权力的压迫,只能依赖于真正平等的学术对话。对话要求双方使用共同的词汇表,而这种词汇表很少能等距离地悬挂在对话双方的中间。”[5]85对话的缘起通常并不平等,双方对话往往来自弱者的请求。为了使对话能顺利地进行,并被真正倾听,弱势的一方常常要屈从于强势一方的词汇表、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将其感兴趣的概念、范畴命题当做不加否定的理论前提。这是弱者举行对话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哈贝马斯向自由主义发出的正是这样一场对话。如果徒有清高,将自己的价值理想束之高阁,与现实隔绝,那么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契机又如何能够从天而降?于是,哈贝马斯选择了“入世”的策略,试图将左翼的价值理想融入到现世的主流之中。而日失激进锋芒,正是他赢得对话机会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哈贝马斯征服了对手吗?亦或被对手所收编了吗?或许,我们很难从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提炼出确切的答案。似乎谁也没有被对方所彻底征服,而谁都因对方而发生了改变。这对于弱势的一方而言,或许也能算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因为它的声音,它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进了主流,并激起了创造性的回响。

然而,这种胜利绝不是最终的胜利,也不是激进左翼最初所期待的胜利。安德森向哈贝马斯发出对话证明了这一点。在安德森看来,真正的胜利不是融入主流后安守属于自己的一片狭小空间,或形同虚设地存在着,而是要走得更远,形成抗衡乃至反征服之势。能否实现这一理想局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话策略。在强弱对话中,弱者的机会在于“通过对方的展开改变自己的形象:借用对方的词汇阐述自己的思想,以至于这种思想颠覆了对方所预设的语言囚牢。即卷入一个语言体系,在对话的语言实践中显露这个语言体系的空隙裂缝,最终逃脱这个语言体系的控制之网而转移到另一套语言体系。”[5]85从这个角度上看,安德森向哈贝马斯发出的对话的意义就在于试图实现更深的潜入与颠覆,并对潜入所可能造成的自我迷失发出强烈的警醒。这既是前一种对话的延续,也是前一种对话的动力。

注释:

① 哈贝马斯认为,可以通过“与真实保持某种内在联系”的多数决定原则来保证由排他性谈判所产生的法律敢于做出任何普遍的规范性断言。对此,安德森认为,由于“多数”是可以改变的,并且通过进一步的理性论证或者其他利益上的联盟,他们的决定是可以废除的,因此,他们对任何代议制共识的销蚀是不会有阻力的,这恰恰是哈贝马斯所给出答案的“自相矛盾”之处。另外,对于哈贝马斯用于区分合法与不合法之法律的道德标准,在安德森眼里,是与其程序标准一样空洞的。因为“什么样的立法今日会存在于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个难以想象的不平等星球上的所有居民的‘平等利益’当中呢？如果以此作为标准评价西方世界的法律著作,这些著作只会成为一堆白纸。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著,袁银传,曹荣湘等译,《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2-153页。

[参考文献]

[1] [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M].袁银传,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陈勋武.哈贝马斯评传[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3] [英]威廉姆·奥斯维特.哈贝马斯[M].沈亚生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175.

[4] 张向东.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13.

[5] 南帆.理论的紧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6] Craig Calhou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99: viii.

Vacillation and Return of "Left"

——On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f perry anderson to Habermas in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JIANG Shu-lu

(Fujia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es the critism of Anderson to Harbermas theory, especially the middle and latter part of the theory from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perspective. This critism is profound, thorough,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t is the outcome of the dialogue in depth, and the driving force for further dialogue.

Key words Jrgen Habermas; Perry Anderson; public field; dialogue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